

西方政界要人 谈和平演变

辛灿 主编



D518

074494

11

西方政界要人谈 和平演变

辛 灿 主编



200046075



新华出版社

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

辛 灿 主 编

新华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 排版

京安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24,000字
1989年7月第一版 1989年9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印数：200,001—290,000册

ISBN 7-5011-0540-5/D·91 定价：2.50元

(限国内发行)

编 者 的 话

几十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干涉、颠覆和渗透，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在赤裸裸的武装干涉失败后，它们越来越强调“和平”的一手，即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界人物近几十年来发表了大量言论，而且付诸实际行动。西方报刊也发表了不少这一类的文章。

为了彻底挫败它们的这一战略，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西方政界人物及报刊关于这方面的言论，了解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战略、策略及作法，从而提高警觉并加以抵制。

本书收集了部分西方政界要人、主要是美国政界要人发表的有关讲话和重要报刊的文章（限于篇幅，大都是摘编，不是全文）。为便于读者研究，

对这些材料中所使用的攻击、诬蔑社会主义的词句和歪曲报道，均保留原样，相信读者是能够加以鉴别的。

由于我们的水平以及各种条件的限制，书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989年7月

目 录

杜勒斯在美国国会的证词	(1)
杜勒斯在美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说	(3)
杜勒斯在白宫发表的声明	(5)
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	(8)
肯尼迪在美国参议院的讲话	(10)
肯尼迪在威斯康星州的演说	(13)
尼克松著作《真正的战争》	(17)
尼克松著作《领导人》	(20)
尼克松著作《真正的和平》	(22)
尼克松文章《与苏联竞争的六种方法》	(35)
尼克松文章《必须使东欧获得自由》	(40)
尼克松著作《1999：不战而胜》	(45)
尼克松文章《美国的对外政策：布什的日程》	(62)
里根就雅尔塔协定签订40周年发表声明	(64)
里根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	(66)
里根在比特堡美空军基地讲话	(71)

里根的对外政策咨文	(75)
布什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年会的讲话	(84)
布什宣布对波兰给予10亿美元援助	(87)
基辛格文章《从现实出发行事》	(91)
基辛格《致美国下届总统的备忘录》	(95)
基辛格对南朝鲜《东亚日报》记者的谈话	(100)
基辛格谈90年代的世界形势	(104)
布热津斯基文章《结束雅尔塔会议遗留的问题》	(109)
布热津斯基就雅尔塔协议问题答法记者问	(114)
布热津斯基文章《共产主义的危机：公民参政的矛盾》	
	(119)
布热津斯基文章《苏联帝国的裂口》	(130)
布热津斯基文章《苏维埃帝国将自行毁灭吗？》	(134)
布热津斯基答《今日美国报》记者问	(138)
布热津斯基文章《苏埃不该拒绝的建议》	(143)
舒尔茨接受摩根索奖时的讲话《美国对外政策的道德	
和现实主义》	(148)
舒尔茨在美国参议院的证词	(155)
怀特黑德谈美对东欧国家政策	(161)
戴高乐在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说	(164)
戴高乐致法国国民议会的咨文	(166)
戴高乐巡视法国东部地区期间的演说	(168)
戴高乐的电视广播演说	(171)
玛·撒切尔对国际民主联盟的讲话	(173)

卡林顿文章谈北约对苏联东欧的政策	(179)
一点一点地把雅尔塔协定碾碎	(184)
废除雅尔塔协定	(188)
西方会资助戈尔巴乔夫吗？	(193)
美国应对贝尔格莱德施加压力	(198)
梵蒂冈推行其东欧政策	(201)
美国一般赞成东欧的改革	(205)
东欧向美国呈现出变革的面貌	(209)
拉拢对手后院的人	(213)
共产党的改革者需要我们帮助	(217)
苏联的自命不凡	(221)
共产党人推行多元化	(231)
苏联集团试图弥合两代人的鸿沟	(235)
父亲和儿子	(239)

杜勒斯* 在美国国会的证词

(1953年1月15日)

这是杜勒斯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的一部分。他提出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解放政策”，鼓吹“必须时刻记住”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达到这一目的。

有一个参议员询问杜勒斯关于他所主张的、与遏制政策相反的“更为有力或更为主动的政策”。

他回答说：

“……只要苏维埃共产主义统治着世界现有各国人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只要它正在设法至少把它的统治扩展到许多其他的国家，我们便绝对得不到巩固的和平或是欢乐的世界。”

*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美国前国务卿(1953年1月——1959年4月)，著有《战争或和平》一书。

“那些被奴役的人民是应该有自由的人民，从我们自己自私的立场看，他们也应该有自由，因为如果他们成为侵略独裁政治的工具的话，他们最后将被熔化成为一个对我们自己以至整个自由世界极其危险的力量。”

“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

“只有不断保持着解放的希望，只有利用一切的机会，我们才能终止这个笼罩着全世界的可怕的威胁，这个威胁强迫我们去作如此可怕的牺牲，使我们对未来存有那么大的恐惧。但是这一切是可以而且是必须以这样的方法完成的，这种方法将不致于引起世界大战，这种方法将不致引起叛乱，因为暴乱会被他们用血腥的暴力镇压下去……。”

“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

(摘自美国新闻处1953年1月23日华盛顿电)

杜勒斯在美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说

(1958年1月16日)

宣传美国是“自由的主要维护者”、“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要使西方的“价值无容置疑”，“它的影响极其深远，而足以缩短共产帝国主义的预期寿命”。

我首先来谈谈苏联的人造卫星。苏联发射一颗地球卫星这件事可能标志着共产帝国主义和自由世界之间的世界规模的斗争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共产党统治者无疑是得到了一个胜利。

共产帝国主义拥有使它得到庞大的力量的各种因素。

统治者们以铁腕控制着人民——将近十亿人民，强使他们服从严格的工作纪律和作出牺牲。

共产帝国主义的指导力量一开始便看出斗争是长期的、持久的，用列宁和斯大林常说的话来说，要

进行“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因此，他们一直进行长期策划，而不求速胜——使过去许多军国主义独裁者遭到失败的做法。

今天，自由面临着比近来的任何一次挑战都更加有力的一种挑战。有权的人们正在狂热地宣称，人类的不同个性和人类的尊严，都是错误的理想，一个唯物主义的、无神主义的社会才能够最好地满足人类的需要，这种社会强制实现一致，把人当作巨大的经济机器中的齿轮。

在面临这样一种挑战的情况下，人们在密切注视着我们自己的社会。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是自由的主要维护者，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许多人都想断定，究竟我们这种自由是不是真是他们需要输入的一种产品。应该由我们来使我们的自由极其丰富，极其具有活力和自觉的纪律性，使得它的价值无容置辩，它的影响极其深远，而足以缩短共产帝国主义的预期寿命。

杜勒斯在白宫发表的声明

(1958年10月24日)

诬蔑说“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宣称要“用和平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

我在福摩萨台北呆了三天之后于昨天晚上回来。我们在那里根据我们的共同防御条约同中华民国政府进行了磋商。这次磋商本来是计划在据中国共产党人说他们将不从大陆进行轰击期间进行的。但是，当我们前往福摩萨的途中，中国共产党人违反他们的停火保证，恢复轰击金门。

这种轰击可能主要是为了心理方面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军事方面的目的。显然，共产党人希望阻挠实现稳定的平静。昨天晚上，中国共产党官方通讯社吹嘘说，“美国原来的利用中国暂停炮轰金门来促进永久的停火的阴谋已经遭到失败”。

共产党人似乎认为，如果他们使混乱和不定的情况长期存在下去，如果他们忽而提供对和平的希望，忽而造成对战争的恐惧，他们就能够最好地实现对西太平洋的统治。他们在采取反复无常的行动的同时又加紧进行宣传说，如果亚洲人民团结起来把美国从西太平洋赶出去，那么就会万事大吉。

我们回来的时候深信中国共产党人不会通过他们的军事努力或者他们的宣传伎俩达到他们的目的。自由中国是坚决的——它的政府、它的武装部队和它的人民都是这样。远东的所有自由国家都愈来愈认识到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它们由于美国的明显的力量和我们反对在武装侵略面前退却的立场而得到鼓舞。

在我看来，亚洲自由国家人民抵抗中国共产主义的侵入的意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

我在台北的时候，我再一次直接了解，中华民国内部占优势的精神不是单纯的军事防御，而是用和平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的精神。政府认识到它作为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同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受尊敬的文化和精神价值的真正保护者和保卫者的责任。它认为，它的使命是使大陆上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而这样做的办法不是使用武力，而是用行为和榜样来支持大陆

中国人的思想和心灵，以使他们是不可征服的。

我回来时深信，自由中国政府是谨慎的、坚决的，并且致力于用和平方法实现它作为中国的愿望和传统的代言人的崇高使命。美国人民对于存在着一个受到这种情感鼓舞的自由中国是可以告慰的。它抵抗着那些其中心目的是统治世界并为此而包围和最后击败美国的势力。

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

(1958年12月4日)

重申敌视中国的政策，声称要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西方“要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

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为我们的宪法的一个目的服务的，这个目的就是：“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享有自由的好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以后的时期中，国际共产主义在欧洲和亚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它统治着大约九亿人民。

我愿意提一下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态度。形势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表明，要是我们给予中国共产党政权以政治上的承认，那对于远东各非共产党国家的政府的生存将是一个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如果给予这样的承认和让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中取得席位，那

就会使他们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大大增加，并使自由国家感到非常沮丧，以致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几乎一定会成功。

我们远东政策所追求的一个要点是不让中国共产党人得到同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威望，作为完全为他们自己服务的工具。这种威望是非常大的。

不让国际共产主义取得外部的胜利，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性的政策。这样做法将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使其越来越谋求它们自己境内的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利用这些人民来征服世界。

艾森豪威尔总统一年前在巴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上发表演说时，说明了他认为是自由世界的政策。他在最后说：“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现在存在有一种获得胜利——这不是打败任何国家人民而得的胜利，而是为了所有国家人民取得的胜利——的高尚战略。”

这就是我们全力以赴地执行的战略。它的代价将是高昂的，这不仅仅是就金钱来说，而且特别是就意志、坚韧性、信心来说。如果具有这些素质，胜利就有了保证。